

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

中国人民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唐朝墩古城遗址平面及发掘区示意图



景教寺院北组中最高台建筑(西南—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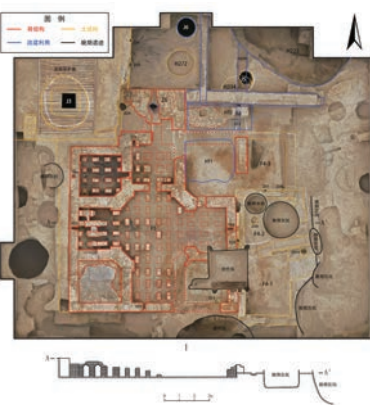
景教寺院遗址出土回鹘文题记



浴场遗址出土陶器组合



唐代院落遗址出土陶器组合



浴场遗址平、剖面示意图



出土开元通宝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宽约60公里的绿洲廊道中部，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2018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5年围绕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考古中国——国家管理与文化认同考古研究——新疆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体系考古”子课题。经过5年的工作，在基本厘清城址布局结构和年代序列的基础上，清理出带有围墙的院落遗址、浴场遗址、佛寺遗址、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寺院遗址等不同类别的遗存，出土了种类丰富、风格独特、内涵多元的遗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成果。

2018年考古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清理探沟2条、房址5组、灰坑190个、灰沟11条、灶6个、水井4口、墓葬2座。出土遗物标本141件，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骨角器、石器、玉器、玻璃等。在发掘的同时，对城内局部地区开展了考古勘探，初步探明了城址总体布局、城墙构筑方式、地层堆积和年代序列，并发现和清理了1处高昌回鹘时期浴场遗址的主体部分。

2019年考古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清理房址2组、灰坑153个、灰沟15条、水井4口、墓葬6座、城墙门址1处。出土遗物标本295件，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铜钱、铁器、骨角器、石器等。在发掘的同时，对城址开展了全面的考古勘探。本年度完成了浴场遗址的发掘，清理了1处唐代院落遗址的东半部，发现并清理东墙门址，基本搞清了城址的形制结构，加深了对城内遗存文化面貌的认识，并初步梳理出该城址唐代至元代陶器演变序列。

2020年考古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清理房址2组、灰坑14个、墓葬7座。出土遗物标本28件，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木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重点对城址中心位置的夯土台基进行了清理，根据建筑的形制结构、出土遗物，特别是墙面上的壁画遗存，确认为一处唐代始建并沿用至元代的佛寺遗址。

2021年考古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清理房址3组、灰坑152个、灰沟4条、水井2口、墓葬7座、灶址3处。出土遗物标本194件，包括陶器、瓷器、铜

器、铁器、石器、骨器、建筑构件、玻璃器、琉璃器、玉器和贝类等，并出土了400余块壁画。本年度主要清理了2019年发掘的唐代院落遗址的西半部，并发掘了城址北部中央位置的1处大型建筑基址，根据该建筑形制和出土的壁画内容及其他遗物，判断为一处始建于唐代、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和元代的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寺院遗址。

2022年发掘面积862平方米。清理房址2组、灰坑116个、灰沟9条、灶址8个、墓葬5座。出土文物标本326件，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骨器、木器、玻璃器和建筑构件等，并揭取壁画3块。一方面对往年出土的遗物特别是壁画遗存开展了室内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继续清理景教寺院遗址的围墙和主体建筑东侧的生活区等结构，出土的大量遗物为考察景教寺院内部人员构成和各类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基本厘清了城址的形制结构和建置沿革。城址整体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西、南、北三面城墙呈直线修筑，东墙沿水磨河岸台地自然地势修筑。在城址东墙中部清理城门址1处，为斜坡单门道结构，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城址南墙中部应建有主要门道。根据城内建筑和街道布局判断，城内存在南北向中轴线，佛寺、景教寺院等主要建筑均选址于轴线之上。唐朝墩古城应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治，始建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延续至高昌回鹘时期和西辽，废弃于元末，是唐朝中央政府在天山北麓构建的军政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见证了唐朝政府对于西域的经营开发，也见证了当地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

二、发现并清理一处唐代院落遗址F6，该院落采用减地法构筑，四周为生土围墙，内部主要包括南北2间主室和多间隔间，出土了较多具有明显唐代风格特点的遗物，该院落遗址自上而下包括完整的元代、西辽、高昌回鹘和唐代地层堆积，出土了丰富的遗物标本和动植物遗存，为梳理天山北麓唐代到元代陶器演变序列和还原自然环境状况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三、在唐朝墩古城的东北部发现并清理一处公共浴场遗址，整体结构由中心部位的砖砌主体建筑(F5)、东侧的土坯建筑(F4)和周边灶址、水井等相关遗迹构成，包括上下两层空间，下层位于建筑地表之下，为烟道和供热的基础空间，上层位于

建筑地表之上，为浴场使用的活动空间。浴场遗址营建于高昌回鹘时期，元代曾被改建沿用，遗址在形制布局、建筑技艺等方面具有浓郁的罗马风格，而出土的各类遗物、装饰彩绘等又明显具有中原和本地特征，反映了东西方建筑传统和技术在丝绸之路之上的交融与创新。

四、确认城址中心夯土台基为一处佛寺遗址，整体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沿东西向轴线对称布局，由围墙、回廊、塔基地宫、佛殿、前庭和前院等6部分构成。根据夯土层位和构筑方式判断，佛寺始建年代与古城一致，后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至元末与古城同时废弃。佛寺遗址地处丝绸之路新北道，是印度佛教东传和中原佛教西进的重要枢纽之一，其建筑结构和出土遗存反映出中原文化和犍陀罗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佛寺遗址也是贯穿古城始终的一处高规格建筑，反映出佛教信仰在唐朝墩古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五、在城址北部中央位置发现并清理出1处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坐东朝西，包括南北两组建筑，由中殿、祭台、若干房间、后廊等部分构成，外围建有围墙，东侧为庭院和生活区，整体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是国内第一处经过系统考古发掘的景教寺院遗址。遗址始建于唐代8世纪上半叶，高昌回鹘时期历经扩建、修缮、毁坏和重建过程，至元末与古城同时废弃。发掘中出土了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饰品、宗教物品等不同种类的遗物，为全方位地考察景教寺院内部的社会生活和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图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遗址内出土了大量题材珍贵的壁画，包括头戴十字架的圣像、手杖、棕枝、回鹘文题记、“也里可温”榜题等内容，体现出丝绸之路之上东西文化的交汇与传播。

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实物资料印证了新疆地区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反映出丝绸之路既是经贸往来的通道，也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通道，更是古代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而兼容并蓄、协调共存也成为新疆地区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的轴线和底色。唐朝墩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西藏曲水温江多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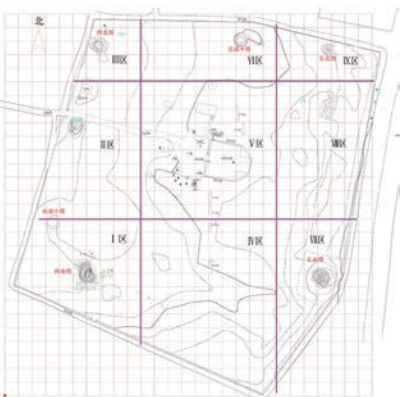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西南塔塔基(东南—西北)



东北塔塔基



温江多遗址分区与遗迹分布图

温江多遗址位于拉萨市曲水县卡纳乡才纳村五组，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政治和佛教中心之一，与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噶迦寺等共同构成了拉萨河流域吐蕃都城文化遗产综合体。遗址现存地面遗迹主要有中心建筑、四角大塔、龟跌等，与桑耶寺四塔一殿的布局相近。2021—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分别对遗址西部西南塔基、龟跌，中部拉康周边以及东部东北塔等区域的1020平方米范围进行了发掘。工作主要围绕吐蕃时期高等级离宫与佛寺遗址布局结构研究、吐蕃时期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与交往研究，多学科研究几个方面进行。

吐蕃时期高等级离宫与佛寺遗址布局结构研究

四角大塔中，西南塔和东北塔平面均为“亚”字形，边长约18米，形制和规格完全一致。通过测年可知始建于公元8世纪中后期，即吐蕃王朝晚期。塔基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塔基叠压于砖瓦倒塌堆积层下，发现有遭到破坏的局部石砌结构，西南塔北侧还发现一道与塔基平行的石砌墙基，从倒塌堆积看，大量使用琉璃质砖瓦等建筑材料为这一期建筑的重要特点。中期塔基为一层石渣夯土层，其上未见倒塌堆积，可能为早期塔基毁弃后一次维修工程留下痕迹。晚期塔基“亚”字形台基保存基本完整。西南塔基东侧贴石壁有一擦擦装藏坑；东北塔基内清理出砧木坑、石砌坑道基槽、圆形石台基础等内部结构。

中部偏西的石碑龟跌区域清理发现一座长方形房址，中部以大石块铺底，四周以石渣土围筑。房址东南的小型祭祀坑内出土陶钵、泥塑动物、铜塑牦牛等。拉康及遗址周边收集到花岗岩龟跌无字碑碑身残块、虎殿顶碑帽残块。

中部中心区域的吾香拉康南、北、西侧发现了位于不同层位的墙体及灰坑，下层遗迹测年为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这表明，该区域应为原温江多宫或“温姜多智愿祖拉康”的核心建筑区域。

温江多遗址考古发掘是吐蕃时期高等级离宫与佛寺建筑遗址的首次科学考古工作。通过两个年度的发掘可知，遗址地层堆积较厚，最深处近6米，早期堆积中保留了吐蕃时期的塔基、土石墙基和灰坑等。塔址和建筑基址以夯土和石块混筑，围绕以带有明显祭祀意味的坑等则应反映了吐蕃本土文化的特点。

吐蕃时期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温江多遗址2021—2022年发掘出土文物标本825件，质地有陶、泥、铜、石、骨、铁四类，以陶质建筑材料数量最多。建筑材料种类包括筒瓦、板瓦、瓦当、砖等以及部分特殊瓦件，如窄板瓦、菱形瓦饰、正当沟等，陶质有红陶、灰陶、褐陶三种。每种材料表面处理方式均有带釉琉璃和不带釉两种，釉色以白色、绿色、蓝色为主，此外还有红色、灰色等。这种多色琉璃瓦建筑材料的集中出土在内地和西藏以往的发掘中均较为少见。其中，发掘出土

的一件菱形瓦饰很可能为无字碑碑帽镶嵌的饰件。大量砖瓦建筑材料的使用表明唐蕃物质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带釉琉璃砖种类和瓦的形制均为典型的汉地特征，与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出土琉璃瓦具有可比性。新修的吾香拉康殿内可见复建拉康时重新利用的吐蕃高等级建筑，如噶迦寺遗址发现的覆莲柱础。遗址内无字碑与唐高宗乾陵和唐中宗定陵无字碑异曲同工，龟跌、碑身、虎殿顶碑帽与唐蕃会盟碑形制相同，等级很高。这些都是唐代“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物见证。

多学科研究

温江多遗址目前已经开展的多学科研究主要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釉样成分分析、样品年代测定等。通过测年可知，中部区域下层堆积年代可到吐蕃早中期(唐代早中期)，西南塔夯土塔芯建造年代为吐蕃中晚期(唐代中晚期)，中上部堆积年代为分裂割据至萨迦政权时期(宋元时期)。动物骨骼鉴定结果显示，从吐蕃至萨迦时期，遗址附近主要的动物种类有羊、驴、牛、狗、马、猪等，早期主要以羊和牛为主。从XRF釉样初步分析结果可知，依照釉成分可分为铅釉、碱—钙釉、钙釉及其他四类，主要为石英成分，测出的助溶剂含量低，可能与风化有关。这些科技考古的收获对我们理解遗址的分期及各时期遗存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编/郭晓蓉 责编/张宸 校对/张怡 编缉/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kaogufaxian@vip.sina.com

边疆考古

吉林琿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2号寺庙址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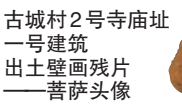
二佛并坐像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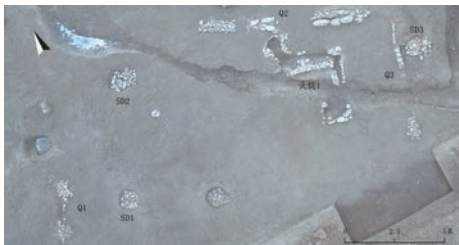
地宫石函内出土铁函图



地宫三维影像



古城村2号寺庙址一号建筑出土壁画残片——菩萨头像



古城村1号寺庙址建筑遗迹航拍片



古城村2号寺庙址一号建筑航拍片(东北—西南)



古城村2号寺庙址二号建筑航拍片(东北—西南)

发掘概况

古城村1号寺庙址、2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琿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侧，地处图们江支流琿春河冲积平原，西距中朝界河——图们江约1000米。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时期(698—926年)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故址——东京八连城。

2016—2022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琿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古城村寺庙址进行了连续7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已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

发掘收获

古城村1号寺庙址

地层堆积 古城村1号寺庙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农田改造过程中遭到破坏。本次发掘的发掘区覆盖了地表建筑构件最密集的区域，共清理地层堆积5层，均为现代耕种形成，⑤层下为生土，并发现打破生土的古代遗迹。

遗迹 遗迹包括墙体基槽4段、疑似磉墩3个、火炕遗迹1处，均为建筑地面以下残留部分，无法确定遗迹间关系。

遗物 遗物发现于地层堆积及现代坑、现代沟中，主要为石质、陶制佛像残块及各类瓦件残片。

造像主要为石质背屏式造像残片，残破较甚，残片数量约1000余件。造像形式、题材与北朝晚期至隋代中原地区佛教造像趋同，且与朝鲜发现的高句丽、百济佛造像存在一定共性，应系公元6世纪末高句丽时期(前37—668年)造像。

瓦件包括筒瓦、板瓦，总重量8.38吨。依据形式特征及制作工艺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与辽西地区北票金岭寺遗址发现的三燕时期(337—436年)瓦件趋同，檐头筒瓦当面纹饰为网格纹复合连纹并带有“壬子年六月作”铭，推测制作年代为公元472年的可能性较大；第二组制作年代不晚于渤海国早期；第三组制作年代应为渤海国中晚期。

年代判定 推测该佛寺始建年代为公元5世纪，沿用至渤海国中晚期，其废弃可能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

古城村2号寺庙址

地层堆积 古城村2号寺庙址共清理地层堆积5层，其中①层为表土层；②层、③层为建筑次生废弃堆积；④层、⑤层为建筑原生倒塌堆积，原生倒塌堆积下发现佛寺建筑遗迹。

遗迹 遗迹包括早、晚两期佛寺建筑遗存。早期佛寺在晚期佛寺营建过程中破坏殆尽，仅发现院落墙体基槽及晚期佛寺台基夯土下开口的磉墩。晚期佛寺建筑布局完整，院落垫土范围东西约120米、南北约80米，中轴线方向为221°，已揭露主要建筑为8处土石混筑的夯土台基(编号：TJ1~TJ8)：

TJ1位于佛寺南北中轴线中央，长方形，东西约17米，南北约14米，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金厢斗底槽”格局，内槽原建有倒“凹”字形佛坛，性质为佛殿。台基中部偏东约1米处发现舍利地宫。地宫内部发现一件石函，内置铁函一件。铁函内发现金、银、铜、锡、玻璃、木、珊瑚等材质遗物3555件，其中包括银函1件、金瓶1件，金瓶内发现7颗银珠，应系影骨舍利。

TJ2位于佛寺南北中轴线南部，近正八边形，边长约7米，台基表面础石有三重，外侧双重为8块，中心一重为4块。推测其性质为佛堂。

TJ3位于佛殿遗址西侧，长方形，现存垫土范围为南北33、东西6米，面阔11间、进深2间。推测其性质为禅房。

TJ4位于佛寺南北中轴线北部西侧，长方形，垫土现存范围为南北23.2米、东西

14.6米。依据现有迹象可知建筑有两重础石，内重中部建有围墙，室内发现4个瓮坑。推测其性质与僧人生活相关。

TJ5位于佛寺南北中轴线北部，长方形，垫土范围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7.5米，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推测其性质为讲堂。

TJ6位于TJ5的东侧，平面近方形，台基已被严重破坏，东西长约14米，南北宽约13.6米，性质不明。

TJ7位于佛寺南北中轴线北部西侧，平面呈长方形，垫土范围东西宽约7米，南北长约26米，面阔7间，进深1间。推测其性质为禅房。

TJ8位于TJ7北侧，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10.5米，东西宽约8.5米，面阔3间、进深3间。

遗物 遗物主要出土于晚期佛寺原生倒塌堆积及次生废弃堆积，为晚期佛寺遗物；部分采集于晚期佛寺台基夯土、院落垫土中，系早期佛寺遗物。类别包括佛像、各类瓦件残片、壁画残片、铁器、陶器、瓷器残片等。

造像主要为石质背屏式佛像残件，可辨识题材包括佛像、胁侍菩萨像等；陶质佛像主要为模制小型坐佛像；并发现大型泥塑造像残片。

瓦件包括筒瓦、板瓦等，总重量132.21吨，依形式特征及制作工艺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为晚期佛寺台基夯土、院落垫土中出土的瓦件，制作年代不晚于渤海国早期；第二组为台基周边原生倒塌堆积中出土建筑构件，制作年代为唐代渤海国中晚期。

年代判定 推测早期佛寺始建年代不晚于渤海国早期，晚期佛寺营建于唐代渤海国中晚期，佛寺废弃可能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

学术意义

推动图们江流域考古遗存年代学研究

古城村1号寺庙址发现了始建于公元5世纪的佛寺遗址，并出土大量制作于公元6世纪的高句丽佛教造像，结束了图们江流域南北朝隋代考古发现空白状态，也为本地区开展高句丽考古提供了重要支点。

本地区虽发掘了渤海国早期王城、中后期都城及王室贵族墓葬，但渤海国遗存的考古学分期尚未建立。古城村2号寺庙址早期佛寺、晚期佛寺具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并出土大量年代明确的不同类型遗物，为确立渤海国早期高等级建筑遗存、佛教造像的年代学标尺提供了重要依据。

古城村寺庙址发掘项目揭露了两处具备一定共时关系、使用年代跨越数百年的佛寺遗址，可视完善本地区5—10世纪考古遗存年代序列的“典型剖面”，是本时段区域考古遗存分期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依托。

促进我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东北地区佛教考古研究

古城村1号寺庙址是我国境内发掘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已知最早的地面式佛寺，填补了研究空白。出土佛教造像对于完善高句丽佛教造像年代序列、明确高句丽佛教造像形式特征并探讨其与中原地区造像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所获“壬子年六月作”铭瓦当等建筑材料为研究三燕佛教东渐高句丽佛教提供了重要线索。该寺址所获材料，对于完善高句丽佛教物质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古城村2号寺庙址晚期佛寺建筑结构完整、建筑布局清晰，为研究渤海国佛教寺院的建筑组合、建筑结构及功能提供了材料支撑。

古城村寺庙址的发掘，展示出南北朝隋唐时期在中原文化影响下边疆地区佛教物质文化的传入与发展过程，对实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